



专刊

总第 107 期

2023 年第 9 期

2023 年 11 月 30 日

信息资料 欢迎交换

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

“总结改革开放经验 助推现代文明建设” 高端学术沙龙

编者按：在新时代的现代文明建设背景下重新解读深圳的改革开放发展经验和深圳发展崛起的历程，将赋予改革开放所积累宝贵经验以新时代价值，11月21日下午，由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承办、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支持的“总结改革开放经验 助推现代文明建设”高端学术沙龙在银湖 CDI 大厦举办，深圳市委原副秘书长、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李罗力进行了题为《深圳勇做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排头兵》的主题演讲、深圳市委原副秘书长、深圳市社科院原院长乐正以《传承 互鉴 创造——浅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为题做演讲、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殷雄以《能源资本是人类文明演化的第一推动力》做主题演讲、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执行院长于长江进行了题为《辩证思维+首创精神》的主题演讲。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马敬仁和陈燕燕等嘉宾，学术沙龙由深圳市博雅文化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段建仁主持。

现将该活动的主要观点进行整理汇编，以飨读者。本刊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马洪基金会立场。

□主要观点

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创会理事长 李罗力——

深圳勇做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排头兵

一、十八大后中国改革的新动向

1、十八大前中国出现新的严峻社会矛盾

1) 过度市场化导致人民群众“三大难”

自1978年开始，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伟大奇迹。但在国家经济不断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严峻的社会矛盾：由于地方政府把抓GDP增长、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改造放在首位，因而大大忽略了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的重任；同时在改革过程中对于最贴近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如住房、医疗、教育等），采用了过度市场化的解决办法，忽视了政府对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的公共政策服务，造成了广大民众买房难、就医难和入学难。

2)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巨大发展成果，并没有完全真正惠及普通百姓，造成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加之当时普遍严重的腐败风气和权钱交易，使得社会的公平正义受到严重挑战，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十分反感和不满，仇富仇官心理日益盛行。

2、解决这些矛盾成为十八大后中国改革不断深入的新动向

1) 大力强调以“人民为中心”

十八大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当时所面临的形势，不但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而且把“为民理念”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融入各项治国理政活动之中。

2) 大力推进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

党中央和国务院推出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大力推进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将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最直接围绕广大群众利益的社会领域和民生领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3) 大力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深化改革另外一个鲜明的特点是，特别强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习总书记强调指出：“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保护人民权益、伸张正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要坚决根除党内和社会严重的腐败风气，根除权钱交易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要通过深化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使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4) 大力推动依法行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大力推动依法行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责，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一大批基层矛盾纠纷纳入法治轨道并加以妥善解决，“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氛围进一步形成。

5) 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

此外，党中央还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2020年我国要实现的伟大战略目标。全面小康，就意味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必须要惠及全体人民，要使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得到全面发展。因此，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就必须全面深化社会改革社会治理创新，非如此，就不可能让改革成果惠及全体百姓；非如此，社会的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改革和创新活力；非如此，就不可能实现全面依法治国，也难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二、国家民政部创立和推广社会改革新举措

1、2014年民政部首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正是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进下，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迅速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1月，民政部首次在全国推广“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实验的内容则完全从切近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从现实社区状况的实际出发，来实验和探索如何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2、2015年民政部开始在全国评选“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

民政部推出“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政策措施果然很快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各地政府都在党中央和习总书记有关推进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大政方针下，积极行动起来。由此，国家民政部自2015年开始，在全国评选“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对于各地在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的优秀典型进行表彰和鼓励。

3、这是十八大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众所周知，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十八大之前，由中央政府确定和推广的我们国家所有的实验区，完全都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类型的实验区如经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区等等，只有党的十八大后，才开始出现了以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为主题的“实验区”，这不能不说是十八大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亮点，也是十八大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4、中国的改革出现新气象和新活力

由此可见，十八大后，党中央所推动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理念，以及国家有关部门所制订的重要实施政策，开创了全国各地在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百花齐放、蓬蓬勃勃的发展局面，为中国的改革带来了新的发展气象，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带来了新的突破和深化，也带来了新的改革硕果。

三、深圳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走在全国前列

1、深圳市每个区社会改革举措都成为全国学习的典范

正如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圳始终作为排头兵冲在经济体制改革最前列一样，进入新时代后深圳同样成为排头兵冲在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领域的最前列。最明显的例证是，自2014年民政部开始在全国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始，深圳市每个区委、区政府都像抓GDP一样高度重视社会改革和社区治理，积极努力，你争我赶，甚至相互攀比，争相创新。近年来深圳市10个区中每个区都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经验，受到国家和广东省的表彰，成为全国学习的典范，这在全国各个地区都是十分罕见的。

2、深圳市每个区社会改革举措都成为全国学习的典范

2014年，深圳市罗湖区以“社区多元融合新机制”获评首届“中国社区治理创新十大成果”奖，并被命名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等4个街道2014年被民政部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2015年福田区又创造了“民生微实事”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项目，引起了全国的高度关注，成为全国学习的典范。

深圳市南山区2014年创建了“一核多元”的社区治理模式，由此构建了“定位清晰、各司其职、功能互补、和谐共生、共治共享”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被中国社科院“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项目研究组评价为“非常有价值的全国基层治理生动实践”，成为全国的典范。

2014年11月，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永安社区等12个社区就被国家民政

部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此后盐田区开始创建一种携手社会组织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模式。2016年盐田区“构建政社合作伙伴关系”入选“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十佳案例”。2017年，盐田又先后获得“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区”和“全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两项国家荣誉。

深圳市宝安区在深圳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以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为目的的社区发展基金会，而且探索形成了指导社区治理实践的党的领导、群众主体和依法自治“三位一体”多元共治的新治理模式。2018宝安区松岗街道的“一格多元”网格化基层治理模式获得了“2018年度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2019年宝安区的“创新治水新模式”再度荣获“2019年度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

深圳市龙岗区在2015年推出了“民生大盆菜”项目，建立了“居民点菜、政府买单”的民生实事工作机制，并于2016年入选“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奖”，；2018年龙岗区的宝龙街道“忠哥调解室”，再度获得“2018年度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

深圳市龙华区在全部36个社区100%推行“社区综合党委+兼职委员”组织架构，由此获评首届“中国治理党建创新十佳”。同时龙华区在全国率先推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与前置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方式，从而构建了社会组织登记、培育、发展、扶持、壮大的全流程体系。

深圳市坪山区2014年就被国家民政部先后确定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和“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地区”，这是全国市级区域唯一同时获得这两个称号的区。2016年，坪山新区的“枢纽型社区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再获“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奖。

深圳市光明新区在全国率先探索社区基金会试点改革，为基层社区治理开辟了新的资金渠道，为在全国推广设立社区基金会成功破题。2014年4月初，国家民政部专家组到新区调研，对社区基金会试点改革给予了“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和示范意义”的高度评价。

3、中国社会改革任重道远

1) 目前人们仍然对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关注度不高

上述深圳市各个区争相在社会体制和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勇于改革，实际上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事实上，今天人们还把眼光只盯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似乎认为这就是中国体制改革的全部内容。

2) 中国社会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任重道远

其实，今天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体制改革新征程的重要内容。尽管现在这方面的改革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中国社会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任务还十分艰巨，目标还十分遥远，道路还十分崎岖，改革还十分深重，但是这方面的改革今后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应当像对待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为其倾力而为、殚精竭虑、摇旗呐喊、勇往直前。

4、中央明确要求深圳在中国社会改革中继续发挥排头兵作用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其中第三大部分“率先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中特别讲到，深圳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的基层治理，改革和创新群团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中央的这个文件，为深圳在新时代继续发挥特区的改革创新示范作用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提出了更高更新的任务。因此，深圳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也必须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朝着更高的目标再出发。

四、深圳在民间监督政府及政府接受监督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1、金秤砣奖评议活动是深圳政府接受民间监督最典型的表现

深圳在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目前全国只有深圳能够大力开展民间第三方机构监督政府部门的活动以及政府部门自觉接受监督，不断改进和提高自己的工作。最典型的表现，就

是深圳市马洪基金会及其所开展的“政府工作民间评价金秤砣奖评议活动”。

2、马洪基金会开展的历届金秤砣奖评议活动

1) 2014年“金秤砣奖评议活动”首评政府部门“白皮书”

马洪基金会的“金秤砣奖评议活动”是从2014年开始的，首先是选择了对深圳市40余个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白皮书”进行评价。为了搞好这个评议活动，马洪基金会独创了一套评估办法，从网络搜索数据到政府部门自报自评，从公众满意度调查到媒体提供专项跟踪信息，构建了一整套的评估基础信息和数据。

最后又动员了将近百名社会专家，根据上述基础信息数据，现场对各政府部门公共服务白皮书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估打分，几十家媒体进行现场采访，并当场公布打分结果，当场公布评奖名单，第二天全部见报。

2) 首次评议活动引起社会巨大反响

第一次对政府进行民间评价的“金秤砣奖评议活动”成功举办后，立即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轰动，不仅深圳媒体，而且广东、香港和国内许多主流媒体都对此大加报道，大加赞赏。

3) 2016年后金秤砣评议活动转向政府政务公开

此后马洪基金会每年都举行一次深圳市政府“金秤砣奖评议活动”。而且自第三届起，马洪基金会将评议政府的方向改为按照国务院有关条例对深圳市政府各个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进行“金秤砣奖评议活动”。到2020年，马洪基金会已经对深圳市政府各部门政务公开进行了连续七届的“金秤砣奖评议活动”。

3、深圳市政府部门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努力改进工作

1) 对首次金秤砣奖评议活动政府各部门的支持率就达六成以上

深圳市政府在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努力改进政府工作方面同样是走在全国

的前列。在马洪基金会刚开展金秤砣评议活动时，由基金会秘书处向深圳市各政府部门提出依申请，要求它们将本部门完成白皮书的信息进行公开。不少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不理解，说马洪基金会算什么机构，怎么会让我们向他们“汇报”白皮书完成情况。当时深圳市43个部门只有26个部门回复了马洪基金会的依申请公开函。

但是尽管如此，给马洪基金会回复依申请公开函的部门也占到市政府所有部门总数的60.5%。这说明了深圳市大多数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第三方机构第一次开展民间评议活动，就给予了相当的理解、响应和支持。

2) 首次金秤砣奖评议活动结果得到各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等到第一次金秤砣奖评议活动结果公布并经媒体广泛报道后，此次评议活动的效果立即显现出来。获得“金秤砣”称号的几个政府部门都在自己官网上头条位置贯以横栏标题，喜称本单位“被社会评为最佳公共服务单位”，是本单位的极大荣誉。而被评为“纸秤砣”称号的单位领导，则受到很大震动，引起了高度重视，立即开始部署整改工作。

3) 金秤砣奖评议活动得到政府部门越来越大的重视和支持

随着后来每个金秤砣奖评议活动的不断深入，影响不断扩大，深圳市政府各个部门对这项民间评议活动给予了越来越高度的重视和越来越有力的支持。以2018年开展的第五届“深圳市政府信息公开金秤砣奖评议活动”为例，作为被评议对象的40个政府部门（10个区和30个政府职能部门）不但有39个都在法定时限内回复了基金会秘书处的依申请公开函，而且还全部在法定时限内回复了20位社会智者通过线上发出的115分依申请公开函。

并且为了如何更好地向智者回函，许多政府部门与马洪基金会项目组进行了100多次的电话沟通。待到评议活动的结果公布后，获得金、银秤砣奖的政府部门都到马洪基金会举办的颁奖仪式上领奖，并且由区委常委或职能局副局长等代表，到台上发表获奖感言。感谢马洪基金会所做的这项督促和鞭策政府部门改进和提高工作水平的举措，并且纷纷表示要在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下，更

好的开展工作，更好地实现政府转型。

4) 深圳市政府部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在国内实属罕见

深圳市政府这种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观念和行动，在国内各省市实属罕见，因此在这方面同样是走在了全国政府转型和改革的前列。

4、2016年马洪基金会将金秤砣奖评议活动扩展到全国

1) 2016年开始“金秤砣奖评议活动”评议各省市政府的政务公开

从2016年开始，马洪基金会联合综发院对中国31个省和32个中心城市政府的财政民生支出水平进行“金秤砣奖评议活动”。从2018年起，马洪基金会又将“金秤砣奖评议活动”转向对中国地方政府的政务公开水平进行第三方民间评价。

2) 2020年开展对地方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政务公开的评议活动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这对各地政府的政务信息公开、政务服务无疑是一次大考。为此，马洪基金会立即启动了“中国地方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政务公开的‘金秤砣奖’评议活动”，旨在通过这次特殊的政务公开的评议，推动地方政府政务信息公开和政务服务的进一步优化，推动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5、2021年后马洪基金会将金秤砣奖评议活动重点转向对基层政府

1) 2021年后开展对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评议

2021年后，马洪基金会将金秤砣奖评议活动的重点转向对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监督、考察和评议。因为基层政府治理是政府对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民生福祉，而且也是为推进和完善中国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奠定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2) 2021年开展全国基层政府治理优秀案例活动

为此，马洪基金会在全国开展了基层政府治理优秀案例的征集活动，并得到了不少省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2021年5月19日，马洪基金会与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在青岛共同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性的“基层政府政务公开研讨会”，此举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影响。

6、金秤砣活动是落实十八大后中央有关社会改革的重要行动

总之，作为迄今为止全国首创的对政府工作开展民间评价的第三方社会智库机构，马洪基金会所开展的“金秤砣奖评议活动”，也成为全国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第三方民间机构评议政府的活动，不仅更好地推动了政府信息进一步透明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推动了政府不断向服务型政府和阳光型政府转型，而且加强了公众对政府社会监督的力度，建立了政府与社会公众良好的沟通渠道，推动了社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是落实十八大后中央有关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精神的重要行动。

马洪基金会这种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创举，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全国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同样起到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五、全国独一无二的“草根”民间智库：“智库百人会”

1、“智库百人会”最大的特点

1) 马洪基金会建立智库百人会迄今为止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创举

2013年马洪基金会开创性建立了“深圳市智库百人会”。这也与“金秤砣评议活动”一样，是一个迄今为止国内独一无二的创举。

2) 由社会贤达和民间智者组成

“智库百人会”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成员全部由生活和工作在深圳第一线的社会贤达、民间智者（包括工程师、医师、教师、律师等等）组成。由于这些智者都是本行业的专家，同时又是本领域里现行体制和政策的直接关联者，因而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和改革有着很多真实的体会和深入的看法；再加之来参加智库百人会的智者，都有关心社会，关心改革，愿意为民发声，为政府献策

的情怀，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思考和研究水平。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把这些人用一个“智库平台”整合起来，对于推动体制改革和改进和完善现行政策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2、智库百人会的独特作用

1) 智库百人会为民间智者搭建了建言献策的重要平台

马洪基金会通过“智库百人会”，给这些民间智者搭建了一个能够通达社会主流媒体和决策层的平台，让这些来自于草根的民间智者能够成为来自第一线的直言谏议的改革者和社会专家，把他们的意见变成能够让社会公众、媒体及决策者知晓的直接来自基层的改革和决策的建议，把他们的智慧集中起来，变成推动社会改革，丰富决策思维的一股重要的正能量。

2) 智库百人会推动扩大了社会改革的公众参与度

马洪基金会建立智库百人会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推动和扩大了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的公众参与度，让更多的社会公众和民间智者参与到改革和政府的决策中，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社会民主法制的更大进步。

3、智库百人会为深圳社会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智库百人会是评议和监督政府的重要专家力量

自2003年深圳市智库百人会成立以来，它已成为马洪基金会开展金秤砣奖评议活动的基本专家队伍。每年向政府提出依申请信息公开，讨论和研究政府的政务公开应怎样改进和提高，最后现场为各个政府部门的政务公开考核情况进行评判和打分，都是由智库百人会的智者们来完成。

2) 智库百人会以各种形式为深圳的改革和发展贡献力量

除此之外，智库百人会每年都针对深圳市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重点和难点问题，开展各种调研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沙龙、研讨会，通过马洪基金会的专刊、专报等渠道，向深圳市有关领导部门提交他们的政策建议报告。他

们还积极参与马洪基金会组织的各项重大活动，成为马洪基金会不断发展壮大的骨干力量。

3) 智库百人会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改革深化和社会进步

马洪基金会和智库百人会现在的工作，就是要在基层进行改革尝试和探索等方面尽可能会地发挥出一些更好的作用；就是要点点滴滴地推动改革，点点滴滴地推进社会的进步。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改革的深入，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政府转型和政务信息公开化透明化，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

深圳市委原副秘书长 乐正——

传承、互鉴、创造——浅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文明的传承本身从来不是问题，但是如何传承才是文明研究要讨论的要点。在族群竞争丛林法则无所不在的今天，如何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海纳百川，在文明传承中推进复兴，是当代中国人矢志不渝的奋斗担当。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彼此尊重、学习互鉴，最应该传承的文明理性就是和平发展。今天，中国改革开放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发展能量，是因为中国形成了见贤思齐、包容互鉴、求同存异的文明自觉，全面开放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文明创造是人类创新的最新境界。创造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就是将现代各种的新理念、新形态引入中华文明的发展中，运用各种创新的技术工具，扩大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通过市场的机制、网络平台来增加社会活力，弘扬现代价值，为民族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深圳不仅应该担负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也应该勇当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先锋。

今天这个会议主题是助推现代文明建设，我从观念上面先做一些认识，文明的概念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只是一些基本的认识。我看了有关的研究成果，我觉得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人种的宗族、宗教会形成不同的文明体系，所

以说，自古至今多样性和差异性恰恰是文明研究的本质和特征。

世界地图五花八门，这几幅图分别是人种的世界分布、世界语言的分布、不同宗教的世界分布和文明的不同分布。看起来五花八门，其实是挂一漏万，不管人种、语言、宗教来讲比这个丰富的多，我们只是挑了最主要、最核心的，把它用世界地图的方式展示出来，说明文明体系确实五花八门。

来看一个世界地图，这个图是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世界地图，西方人的世界地图是500年前一个荷兰人编制的，体现了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欧洲在世界中心，之所以这个世界地图目前在全世界最流行，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欧洲人看世界其它地方角度是不一样的，从中间一分为二，刚好欧洲在最核心的位置；第二，这个地图也是私心比较重，荷兰人在北半球，它明显把北半球放大，把南半球压缩，中国都显得非常小，这明显把北半球放大，东方和西方的认识，南方和北方的一种认识，在世界地图上面显现的非常清楚。这个一看就知道是美国人搞的世界地图，把美国放在世界中心的位置，也就是美国对人这个地图感兴趣。这个地图告诉我们什么呢，不同的价值体系，不同的知识体系，它会造就文明的不同目标追求，文明要追求什么东西？西方人的世界观和中国人的世界观，从世界地图就能看出来显然差别太大。上面这是我们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世界地图，但是下面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它把世界地图倒过来了，这是澳大利亚人编制的世界地图，把澳大利亚放在上面，把俄罗斯放在下面，南北倒置的世界地图。所以别看这是世界地图的问题，实际上是不同文明的世界观，差异太大。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感觉是对文明的研究本质上已经变成了对文明差异性的研究，文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差异性，其结果衍生出来对文明的分类研究和文明关系的研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把文明分为八大块，上图显然是把南极放在核心位置，如果世界流行这个地图，人们的世界观又是另外一回事，上面这个是北美，下面是南美，关联这会造成人们世界观非常大的误读。下面是联合国的会徽，这个会徽里面西方是在最核心位置，其它都在外围，联合国的会徽也显现出西方对世界文明的巨大影响，联合国的会徽也能显现出来。下

面这个是所谓的世界文明地图也是按照宗教、地域把世界划分成几大块。

文明发展中的传承问题。传承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在参与，我们大家的饮食起居、语言文字、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无所不在传承，下面林林总总好像是把中华文明的东西罗列了一下，回想一下，我们每天都在经历这些事情，所以“传承”几乎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是所有族群“社会化”的必然，没有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在进行某种文明的传承。80亿人没有一个例外，他一定是每天在进行着某种文明的传承，文明的传承本身从来不是文明的问题，但是如何传承才是文明研究要讨论的要点。

在今年放开了以后，我自驾两次去了云南、西藏，又去了浙江，我的一个新的感觉，00后包括90后几乎在所有的旅游景点都穿上了这样的民族服饰和中国古典服饰，不是一两个，是成群结队，包括我这次在浙江乌镇、南浔都是，00后的女孩子，女孩子比男孩子多一点，这变成了一个现象级的问题。而且大家都知道照相馆关门了，摄影现在也变成了个人的东西，但是现在有一个新型的东西叫文旅摄影，特别火爆，就是对着年轻人穿着汉族、民族服饰的这种，它出售服饰帮助你化妆，全程陪伴，帮助你摄影，这个行当现在是非常热门的行业，生意非常好。这个现象透露的是什么呢，传承它不是某一个领导或者某一级政府号召的事情，是所有的人自觉不自觉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像这个照片显现出来的东西，我们现在几乎无法回避。

从全世界来看，文明的源头肯定是多元的，但是经过历史长河斗转星移、千变万化，在诸多的文明体系中生命力、传承力最强的是中华文明，发展力、影响力最强的是西方文明。从中间这个世界地图就能看到，西方文明对全世界的影响，虽然把非洲、亚洲画成灰色，好像在它的涉及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在座的都知道西方文明对东方社会包括对非洲的影响也是无处不在、深入人心，所以没有一个文明体系的影响力有这么大。当然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的生命力、传承力最强，这是我们的优势。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天人合一、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家国情怀、修齐治

平、和衷共济，不忘来时路，不忘养育恩是中华文明，传承中华文明是我们的天然属性。但在族群竞争丛林法则无所不在的今天，如何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海纳百川，在文明传承中推进复兴，是当代中国人矢志不渝的奋斗担当。文明的传承并不是一个非常浪漫、温馨的事情，包括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的巴以冲突算不算是文明传承中的一个冲突？我想肯定和文明传承有关，大家追溯为什么巴以这么惨烈的冲突，一定能够从这两个不同的文明体系当中找到它的根源。从绝大部分人而言人们更加愿意看到在联合国里面，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彼此尊重、平等交流、学习互鉴、合作共赢，最应该传承的文明理性我认为就是和平发展，这是全世界不管什么文明体系，都应该追寻的一种文明理性。

互鉴，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为何能够历经风雨、经久不衰，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我个人理解，这两种文明都共同具备了联通五洲、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开放品质。谁更加具有开放的自觉，生命力会更强，现代文明的一大特点，要素形态和链接工具不断创新，能量成倍的放大，人类文明成果广泛交流的障碍不断被消除，互鉴融合变得更加方便可行，因此文明互鉴的自觉和能力不仅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必然，也是应对当代文明竞争的必需。如果你没有这种互鉴的自觉和能力，你在当代文明体系的竞争中不可能作为胜利者。

今天，中国改革开放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发展能量，恰恰是因为中国形成了见贤思齐、包容互鉴、求同存异的文明自觉，全面开放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一点不管是上海的进博会、北京贸博会、深圳高交会都是中国全面打开国门，吸纳世界各方面的优秀成果。从我们普通的市民来看，每天出门看见中国街上到处都是万国车，到日本街上三分之二是日本车，韩国80%是韩国车，在东方社会，只有中国的街上跑的是万国车，一直到今天这也是普通市民享受开放互鉴的实惠。

40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推进，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回顾4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开放学习互相借鉴是我们成功的关键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上合组织、金砖国家，这些都是表明了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合作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

从深圳来看更是如此，深圳的奇迹就是以开放促改革，当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时候，先把国门打开，就知道是什么市场经济了。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促升级，所有的这些成功都是因为深圳在中国率先打开了国门。所以我们的华为终端总部会建立一个欧洲城，在中国大地建立一个欧洲城，说明华为的确是一个国际企业。

40多年来深圳作为中国率先开放的经济特区，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500亿美元，深圳外贸出口超过了大部分国家的出口，连续30年排名中国城市第一。作为一个从中国开放式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新兴都会，深圳是海纳百川、文明互鉴的城市典范。深圳的这些企业细想起来它们有什么共通性，它们都是具有全球化的视野，走向全球化的市场，深圳的企业家每天都在国际航班上飞行，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了解一下人家在思考什么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我们有什么不同，有了什么新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机遇，这都是深圳企业家最关心的，深圳企业也是中国最早加入国际产业链条和国际创新链条的企业。

关于文明发展中的创造。文明创造是人类创新的最新境界，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它是文明发展中寻根问祖的守正性，文明发展生命力最终取决于文明的创造力，包容互鉴给文明发展智慧的源泉，只能创造才能将传承互鉴的文明成果化合裂变产生新的文明基因，哺育出新的文明成果。现代文明的创造离不开当代人类共同文明价值的确立，也离不开文明之间的关系准则，3个超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反复强调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文明创造中最应该反对的是傲慢、封闭、偏见。

创造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就是将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数字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新理念、新形态引入中华文明的发展中，运用各种创新的技术工具，扩大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通过市场的机制、社会组织、网络平台、多媒体来增加社会活力，弘扬民主法治和谐友善的现代价值，为民族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

在当今人类多级文明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未来人类文明是否能够和平发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西文明能否开放包容、平等互信。东西方两大文明应该相互尊重、平等交流、互信互鉴、合作发展。不同现代文明体系之间最大的问题缺乏互信，你说的我不信，我说的你不信。

粤港澳大湾区过去一直都是东西方文明的历史交汇点，目前大湾区仍然是中国最开放多元化发展的地区，一国两制三区，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创新集群第二位，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的潜力巨大。特别是深圳目前在数字经济、新能源、智慧城市、生态和谐方面确立了某些优势。深圳不仅应该担负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也应该勇当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先锋。

这是围绕今天沙龙的主题谈谈我个人粗浅的认识，谢谢各位。

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 殷雄——

能源资本是人类文明演化的第一推动力

本次学术沙龙的主题是“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助推现代文明建设”，以期达到“传统文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形成”。

说到文化，这是一个其大无比的主题。文化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品格，文明则是文化的表达。一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由政治文化为主线、派生出来的一系列规范与引导人们对待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态度与方式。

中国的政治文化，本身就很复杂，简单的理解，就是治国理政的基本体制。从夏商周以降，直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这三千年以来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且不论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野在哪里的学术分歧，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春秋战国之后的分封制并没有完全消失，因此说它是封建制度，

也有充分的理由，“封建”二字不完全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其实质而言，大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虽然没有完全消除地方割据的威胁，但总体上历朝历代有效的治理主体，还是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疆域的完整。在此过程中，集权与分权（君权与相权、中央与诸侯）虽然一直在争斗，但总体上维持了中央政权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独裁体制。这一治国的指导思想，从管仲、韩非、商鞅等人的著作中看得很清楚，都是强调“君主独制”。

就政治治理文化的传承而言，我刚才说，三千年来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如果有人硬要说历代都有不同，也都有其特点，有的还有进步性，也不能说错。实际上，自从被毛泽东称为“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武王伐纣之后，其间的历次所谓“革命”，并没有建立起先进的制度，王朝兴替之时，很多东西都没有变，不要说制度上“汉承秦制”，甚至相当部分的官员都是前朝的，所谓“官仍其职，民复其业”。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历史逻辑之中，要说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很是牵强附会。相反，有些事情反而是倒退。比如，秦汉时期尤其是汉初，皇帝与丞相都是坐着论事的（拜相的仪式隆重，坐而论道的基本礼仪）；唐宋时期皇帝坐着，丞相站着；明清时期干脆取消了宰相制度，皇帝坐着，大臣跪着。这与先秦时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朴素民本思想相比，倒退了不知几条街，臣民的人格尊严被践踏得无以复加。

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的真实演进，到了清末，这种体制实在是走不下去了，才引发了李鸿章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政治历史概念。李鸿章曾经两次上奏折，提出这个概念。

第一次是1873年（同治十二年），上《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啥意思？就是海洋文明、商业文明，严重地冲击着中华传统的农耕文明，老一套不成了，我们要变法（也就是改革）。

第二次是1875年（同治十四年），上《筹画海防折》：“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啥意思？就是西方列强亡我之心不死，而且他们很抱团，我们要加强海防建设，准备打仗。

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之前”，是西周，大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那时是一个什么状况？我大体上做了一点整理和分析，概括地说，就是“周公辅政，成康之治”，具体内容或成果有四项：克殷建周、封邦建国、制礼作乐、致政成王。汉代政论家贾谊在他的《新书》中说：“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在李鸿章的眼中，三千年前有周公这么一个人，三千年之后的今天有谁呀？是不是他自比周公？不得而知，反正是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再守旧了。他说的三千年之大变局的现状，可以概括为“国弱民穷，半殖民地半封建”。具体地说，表现在五个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的含义，我们也可以按照以上的分析方法进行简单的梳理与分析。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可以概括为“国破家亡，民不聊生”。这是有事实根据的。1867年（同治六年）6月20日，直隶总督曾国藩与他当年办湘军时的幕僚赵烈文聊天，曾国藩说：“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割。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国藩听了此言，甚感绝望：“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果不其然，曾国藩于5年后的1872年去世，一了百了了，在他的身后，是一个气息奄奄的大清帝国，也于赵烈文预测50年内的

46年（1911年）灭亡了。赵烈文真是神算子啊。

曾国藩是国家的重臣，是三大中兴名臣之一，面对此情此景，他是一筹莫展，只想一死了之。可是，死也不容易啊！李鸿章的《绝命诗》中就说“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与之相比，明朝重臣袁崇焕的《绝命诗》稍微乐观一点：“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实际上这种乐观没有根据，他死后没几年，满清入关，我华夏大地落入异族之手近三百年。梁启超对李鸿章的命运非常同情：“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一百年前的中国，发生了六项重大历史事件：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废除科举、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它的历史意义：废除了封建帝制，引入了科学与民主（赛先生与德先生）的意识。

那么，百年之后的今日中国，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具体地说，也表现在五个方面：

百年大变局的现状：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政治上：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

——经济上：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但环境污染和能源缺乏成为最大的隐忧；

——军事上：中国拥有了足以保家卫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但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综合实力相比仍有明显的“短板”；

——疆域上：中国成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中华版图得到确实的保障，但以“台独”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仍然猖獗，历史遗留问题尚多；

——文化上：随着中国逐渐回归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文化自信成为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动力，但与西方所谓的“基督教文明”的摩擦也日益增多。

应对之策：

——坚持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不动摇；

——中国只有接纳世界，才能表达世界。

中国老百姓历来的最高理想，就是希望生活在太平盛世。对于什么是太平盛世，真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比如鲁迅就认为：“所

谓盛世，就是老百姓想做奴隶而做稳的年代；所谓乱世，就是老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年代。”从客观、理性分析问题的角度，需要给盛世定出一个标准，我本人赞同这样的四条标准：华夏一统（至少是统一中原），确立东亚地区宗主国地位，人民生活相对安定，持续时间20年以上。按照这样的标准，我梳理了一下，从夏朝的少康中兴到清朝的同光中兴，共有16次，其中南宋的“乾淳之治”很勉强，因为南宋只是一个偏安的小朝廷，中原并未统一，朝中有识之士还是盼望统一，所谓“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我说的20年的这个标准，其实是很低的。就以唐朝贞观之治来说，只有22年；开元盛世29年。即使如此，也很不错了，老百姓想做奴隶可以做稳了。唐朝史学家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讲的主要是贞观前期的事情，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表演一塌糊涂。

关于改朝换代的原因，今年的4月15日，就在院里举办的我的新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发布会暨治理思想研讨会上，我讲了两条：

——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在其终结的末期，并不是由于国运即文化的衰败，而是由于政治领导力的下降。政治领导力主要表现在政策的贯彻力、局势的掌控力和民意的引导力。

——每一个王朝的末期都会出现中央政府（朝廷）的权威性大大下降，对地方政府（诸侯）失去了控制能力，随之而来的便是民意汹汹、人心思变，也就是人民与政府的离心离德。腐败现象只是这种政治领导能力下降的一种表现，腐败本身并没有对文化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除了这两条，还有一个我总结出来的“代际衰竭定律”：不知“艰苦功德”（稼穡之艰，创业之苦，节俭之功，自律之德）。

其实，这两条也只能算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由于人口的增加而导致“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也就是“一切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

人类社会从火到电，走了十万年。在这个漫长的旅途中，要说没有进步，尤其是技术上的进步，那是不正确的。但是，要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是不确实的。事实上，哪怕是历史的自然演进，也会有一些进步，比如建筑技术或艺术，明朝建的房子，总要比夏朝、甚至唐朝建得好一些吧。但是，大体上说，工业革命之前的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形态，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这个结论还是站得住脚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大一统王朝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那种“百家争鸣”呢？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历代统治者都必须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针，否则，政令不出皇宫，臣民思想各异，势必导致国家分裂。因此，不论是汉初的黄老思想，还是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都是当时治国理政的客观需要。有人说，“儒术”没有错，错在“独尊”。其实，“独尊”不“独尊”，主要看当时的需要，而不在于当时的人或后来的人喜欢或不喜欢的价值取向。即使对于“儒生”的态度，也是看碟下菜的。比如，汉武帝的孙子汉宣帝，他的太子对他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他还说：“乱我家者，太子也。”这个太子，就是后来的汉元帝。

中国历史的发展逻辑：华夏大地大一统的社会形态的维持，需要一元、而不是多元的意识形态和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历史演化过程中，也有有识之士，试图对思想政治领域的某些具体内容进行一些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比如，王安石变法中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废除诗赋，主要考经义、理财知识、法律知识和策论。宋神宗拿不准，征求苏东坡的意见，苏东坡上奏折反对：“（诗赋这种形式）历代用之，为取士之制。追古不易，高风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号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胜其弊。”

王安石认为诗赋这种东西不能富国强兵。我个人认为，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春风又绿江南岸”，不管是绿，还是到，还是过，都是一回事，对农作物的收成没有任何影响。再看苏轼的“高考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讲的是赏与罚都可以表示当政者的忠厚之心，还有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都是空论、泛论，没什么意思。王安石与苏轼对于高考要不要吟诗作赋，有不同意见，但都不影响他们都是诗文高手。这也算是文化的影响力吧。

工业革命之后的情形就不同了，它是资本主义得到高速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为什么是这样？是资产阶级这个团伙的能力很强吗？不是。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一种更为强大的物质推动力——能源资本。能源结合人类的劳动，转化为能源资本，可以不断地创造价值。我们在研究能源资本的过程中，总结概括出三大基本原理：能量价值的循环累积增值原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资源配置的稀缺性法则。我简单介绍一下“能量价值的循环累积增值原理”，它包括四个关键词：发现、凝固、传递、增值。

——能源形态的能量价值发现。火，使人类摆脱了吃“色拉”的境地，吃上了熟食，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使人类具备了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自身条件。火的价值，被人发现并且凝结在人的大脑之中。

——价值通过技术平台的凝固。火的工业化应用，使有些物质被烧“硬”了（陶瓷），有些物质被烧“软”了（金属的冶炼与器具的制造）。火的价值，被凝结在物质形态之中。

——价值通过商品交换的传递。从柴草到新型能源形态，只是能源形态的转型，其能量价值的“内核”被不断地发现、凝固并传递，展现了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属性的过程。

——价值循环累积的增值效应。从火到电，人类走了十万年。在这个漫漫长途跋涉中，人类先后发明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技术工具，都成为凝结人类

文明成果的载体，其背后的推动力无一不是能源价值的“内核”——能源资本，使得能源的价值通过循环累积产生了增值效应。

关于循环累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曾经提出一个“循环累积因果原理”：从一个动态的社会来看，社会经济各有关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这后一因素的变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前一因素的变化，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累积的循环发展趋势。

人类今天所拥有的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无一不是这个“能量价值循环累积增值原理”的产物。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科学技术的推动力是能源资本，因此，我们可以再发挥一下，得出这样的结论：能源资本是人类社会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演化的第一推动力。这个结论，诠释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讲的那段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最后一句话的含义，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强调“人”这一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价值。

具体说到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科技创新的沃土，也是乐土。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抽象价值观，具有石破天惊的启蒙意义。

人类启蒙运动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告诉一个社会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基本价值，以及基于这些价值，应该建构什么样的制度，形成民意上的软约束或者压力。全球近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无不以思想启蒙为起点。

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一次启蒙运动，它的开创者

就是邓小平同志。恩格斯在论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小平同志就是开创我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历史巨人，无人可比；莲花山上的小平雕像永放光芒！

对于能源领域来说，深圳是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的诞生地，它的寓意，就是通过这个项目，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无比强大的核动力。这个历史意义是独特的、永恒的。

大亚湾核电站有两张名片：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个大型中外合资合营（JVC）企业。

JVC（Joint Venture Company）这种企业经营形态，既是改革开放的“帕来品”，又是改革开放的衍生物，也是深圳创新文化土壤的催肥剂，更是深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导向器。以大亚湾核电站为起点，我国的核电产业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世界先进水平，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大亚湾核电站落户深圳，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拓荒牛、排头兵的角色。当时，粤港地区普遍缺电，1979年广东全省年发电量仅80亿千瓦时，2022年是7870亿千瓦时，增长近100倍；当时国家外汇结存不到100亿美元。当时有两种思路：一是开发广西红水河的水电资源，二是在毗邻深圳和香港的地方建大型商用核电站。最后选择了建核电站，实质上就是选择了现代最先进工业文明的成果。

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有两句诗：“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它告诉我们，旧，总是孕育着新；新，总是脱胎于旧。一种制度或一种文化，即使是合理的，也并非意味着它们是必然的；它们在今天“只能如此”，更不意味着它们在将来也会“一直如此”。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的导读中说：“历史往往意味着路径依赖，意味着制度惰性，意味着文化惯性，而对历史的超越则更取决于人们刻意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它告诉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有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实现治理现代化，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观察或评判现代化的两个视角：问题导向，

实践维度。

深圳未来的文化标签：创新之城、科技之城、财富之城、活力之城。

这“四城”的载体，就是一个一个规模不同、形态各异的企业；没有企业作为载体，其它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执行院长 于长江——

深圳——辩证思维+首创精神

我这个发言算是命题作文，是为了这个活动的主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助推现代文明建设”而准备的，本来还有点担心大家话题会不会太集中，内容会重复，现在来看还好，几位演讲人谈的是不同的维度。我还是就这个主题谈，围绕着深圳来谈一些感想，想从“辩证思维+首创精神”的角度阐述深圳，话题还是老话题，谈三方面：

首先，这个想法来自于二十大报告和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近来经常讲这些方面的内容。二十大有一些重要的提法，像“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还有最近习近平文化思想里面提到的“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觉得这些提法很重要的方面，是对我们认识深圳有新的启发。在座的嘉宾都是在深圳多年，且一直在反思、思考深圳，我们既身在其中，同时也是不断理解它、阐释它。当初我们决定来深圳这里办学，就是要把深圳这座城市本身作为共同学习成长的大课堂、实践场和学术灵感之源。

新时代新发展，为我们认识深圳提供了新的启发、角度，比如说关于深圳创立特区，这件事情我们原来更多从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等角度来看，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认识论方面的转变。当年伴随深圳，全国有一个真理标准讨论，强调实践性，要用实践检验真理，这和现在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很重要的关联，而深圳的经验又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现在我们可以

从很多新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议题。

这个马克思与孔夫子会面的图是网上传的，因为近来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前不是完全没有这个提法，但是作为这么高层次的明确的提法，还是刚刚才有。这也启发我们从这个角度思考很多问题，包括对深圳的理解。

在革命时代，老一代革命者就曾经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毛泽东把这个结合概括为“实事求是”，这个概括，对于当时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理论建构，实际上现在还是很重要，但在深圳，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确定了大方向，很长时间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建设，就不太多谈这一类话题。大家也知道，在新中国建国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各界都经常讨论像辩证法、形而上学等认识论、方法论方面话题。我们现在回过头看，如果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和中华传统相结合，这些话题跟深圳也有很大的联系。

深圳建特区这件事，我们一般常说是领导人画了一个圈，但应该看到，这个圈如何能画，这背后有很重要的哲学思想，就是一种辩证思维和一种实践观。

说起“辩证”，回到当时那个时代就知道，之前的30年我们在思维、思想上陷入了某种比较固化的状态，比如说当时对于很多具有矛盾性的现象，比如说姓资和姓社、经济和政治、城市和农村、知识和劳动、市场和计划、国际上战争与和平等的关系问题，当时某种程度上偏向一种绝对化思路，缺少辩证思维的思想方法。人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辩证思维非常强调矛盾双方是对立同时又统一的关系。比如市场和计划，它本身是有对立性，但是也有统一性，而且特别要注意，这个矛盾双方是可能转化的。辩证思维包括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叫“特区”，特区当时很重要的一点，它是指这里的特殊性和全国的普遍性的关系，而如果把中国当时的情况放在全世界范围看，又是个特殊性，这里面保持辩证思维很重要。而当时比较重要的是，做这个决策，支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思维上是

辩证思维的，是真正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而当时不太认同这样的方向，往往就是陷入了一点当时常说的形而上学的争论和讨论中。

现在反过来看这段历史，能体会到这一层含义，比如其中一个要点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刚才乐正教授也讲到文明，对于文明这种“扬弃”的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上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观点。如要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就要依靠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要尊重人的首创精神，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和中国的很多实践是有关联的，而且跟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有契合。所以这一代领导人体现出来的，我们能看到的是政策的转化，实际上深层次里面是思维方式在起作用。比如“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借鉴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这段话就非常重要，就是集中体现了“扬弃”这个概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哲学思想里面有没有扬弃的观念，。这段话虽然是谈政策性的指导或发展方向，但它体现我们对一个事物的理解上，要有这样一种认知，就是一个先进的东西是包含对前一个东西的继承、汲取和发展，它们之间是有这样一个辩证关系的。

同样，实践观，体现在深圳的很多创新实践中，像“实干兴邦”这种实干精神，就体现了实践性。

再讲一下“主观能动性”的问题。深圳的发展很大程度是基于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深刻认知，这方面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观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也对人的主动性有非常强的认可，也是一种鼓励。我们现在谈深圳的经验是什么，当然，改革开放是重要经验，这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深圳的特点在哪儿？可以说深圳的特点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词也是早就提了很多年的，在深圳和改革开放之前就一直在提，革命时代、红军时代、战争年代，建国后建设社会主义时代也在提。但是，深圳在这个意义上，和之前的区别或者其它地方的区别，在于深圳讲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具体的人、个体的人、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

这段历史不用详细讲，在座各位都知道深圳如何一路走来的，这个地方作为先行示范，最早在制度上与内地有些不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都到这儿来，而来的这些人大部分本身是主观能动性比较强的人。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人在原来的体制下没有发挥出来？因为原来体制总是把“人”作为一个总体的、群体的、集体的“人”，说“主观能动性”也总是指群体的主观能动性。而深圳当时的不同，就在于发挥了具体的、个体的、每一个人的、张三李四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在哲学上本也叫“自觉能动性”，这种“自觉”非常重要，它是自主的个体的主体性行动，而特区之“特”，其实就是对人的行动限制比较少。

这些自主的行动不断形成自发的秩序。在深圳，叫市场经济也好，叫什么也好，它还不仅仅包括市场经济，也包括日常其它方面由契约精神和博弈形成的法治规则，这种秩序主要是自发自愿的，是更加自然的。

自发和自然，也体现在各种自我优化和改进方面，深圳民间的、微观的优化一直很活跃。大家去观察任何一个居民区或城中村，尤其是城中村，各种自我改善的变化每天都在发生。如果观察一个地方，观察半年一年两三年，会发现每家店铺都在自我改进，很少有完全停滞不前的。每个主体的人在小的微观层面上，都有这种自我优化的主观能动性，都在各自顺其自然的进行这种改进。深圳内在的力量，它能够从一个小镇爆发式地变成一个大都市，很大程度上在于民间的这种活力和动力。这里面就包含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这个主观能动性在这儿，人在这儿，关键是如何发挥？“发挥”的过程，我们表面能看到的是“敢闯敢试”，实际上“宽容失败”和“容错”是最重要的，“容”确实是最关键的前提，当时有些做法就是特区才能容，别的地区不能容。“敢”是相对的概念，胆大的人也不是什么都敢，要人们都像亡命徒不计后果也不可能，敢不敢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宽容，有宽容才能敢，不能想象普通人为了“试”而付出太大牺牲。

所以说深圳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个“发挥”尤其重要，要分析“主观能动性”包含什么，有什么规律。

发挥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在于让不让、能不能创和闯，也就是如何对待“首创精神”，而深圳在这段历史上，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最守正的一代人开辟了新的路径，体现了这些革命者的历史担当，他们真的是有一种革命的精神，他们的革命，不是简单的革命成功就结束了，他们是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不断的在上下求索。

一个社会如何尊重一种首创精神，是能否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键。社会发展就要尊重首创精神，不管是在马克思著作中还是在中国革命中，一直在谈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早期在红军时代、革命时代，毛泽东在讲调查研究的时候就讲“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现在领导人也讲“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都强调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源自人民群众首创性的想法，深圳不管是叫试验田、排头兵、还是先行先试，里面都包含着尊重人们的首创精神的作用。特别要强调的是，尊重首创精神也是多少年来全国各地都一直在谈，一直在说的概念，但是在深圳语境下首创精神的特点表现在哪儿？我觉得还是表现在个体的人，具体的人的首创精神，是民间的社会微观层面的首创精神，就是民间的活力、适应力和创新力。比如深圳早期就出现过“红绿黄灯”之说，遇到红灯怎么办，遇到绿灯怎么办，遇到黄灯怎么办，我记得当时争议也很大。但这实际上就反映了民间的那种活力，那种调适力和变通力，民间这种顽强的韧性的适应性，它背后反映的就是所谓“社会规律”。其实哲学上特别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关系，这个关系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论述，在此不赘述。如果简单地说什么叫规律？规律就表现为韧性的、反复再现的、有时屡禁不止的东西，往往背后隐含着某种规律。有时候当找不到办法的时候，就可以想想那些屡禁不止的事情，就是某种往往显示出韧性的东西，可能就是答案。

首创精神，在深圳的特殊之处，也是在于每个人、每个个体的首创精神，这方面，原来至少在改革早期，在相当一段时间，全国其它的地方都不如深圳，深圳体现出对个体首创精神的特别尊重。

还想强调一点，深圳经验中，那些没有成功的努力也非常重要，我们的经

验总结，不是光总结成功经验，也包括那些可能中间因为什么原因不了了之的或者半途而废、夭折的经验，这些努力有时候包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对我们进一步的建设、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性。

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理念是深圳发展很重要的力量。它使得深圳活力四射，不管其它方面如何，总有一股力量在往前推动，其实就是靠这种首创性。像大芬村，很多人都说它不伦不类，到底算艺术还是算产业，但是深圳就搞出来了，不管它是什么，觉得好就这么做……这都是属于很首创的范例。一般人们说深圳总是谈经济方面、科技方面，其实深圳在文化、艺术、生活等方面都有很多的首创性。

一般谈深圳，大部分都从“敢”和“闯”两个角度谈，比如先行先试、敢闯敢干等等，但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建市40年之后的深圳，再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视角来看，深圳这个城市的气质，包括它代表的深圳人的人格倾向，也可以用一些很传统的文化概念来诠释，我在这里就用这3个字：仁、知、勇，这是儒家文化当中很重要的概念，讲的是“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我们原来谈深圳更多谈的是“勇”，就是如何敢闯、敢为天下先等等，这是对的。但现在深圳已经走了40年，不是创立之初的特区、开发区，而是一个大都市了，回溯一下，我们会发现当年的“勇”字当头，一路走来，带来的结果反而更多的是前面的两个字：仁和知。

仁，是说深圳现在变成了志愿者之城、慈善公益之城，比如“来了就是深圳人”，这种说法就代表一种深厚的“仁”。“知”就不用讲了，深圳崇尚知识，读书月、图书馆、科技产业等等，都谈了很多。从历史看，深圳是从“勇”开始，突破旧体制是勇，对外开放也是一种“勇”，若没有勇气，畏惧恐惧，就会封闭。所以先是勇，然后达到了“知”，科技也发展了，高端产业也发展了，文化也发展了，最后越来越多的人当志愿者，做公益慈善，达到“仁”。

如果从当下看深圳，不从历史角度看，这个城市在今天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反而首先是“仁”，这个状况也是符合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到上

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勇是搞经济，有了它才有更高层的“知”和“仁”。实际上当下，深圳在“仁”这方面反而体现更靓的特征，民间自发的志愿、互助文化、公益慈善很发达。站在今天的视角认识深圳，不妨从一个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认知，不一定总是只讲原来“敢”和“闯”的勇，而更要讲“知”和“仁”。

好的，我的心得就汇报到这儿，谢谢大家。

《马洪基金会专刊》是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编印的内部参阅资料。

- ◇ 读者群为基金会上级领导部门、理事和名誉理事、智库百人会专家学者及其他机构、企业的高层管理者。
- ◇ 主要内容为重大研讨活动、论坛、沙龙等学术交流中富有价值和启发性的综述文稿及学者文章。
- ◇ 稿件来源以马洪基金会及智库百人会的专家智者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积极参与。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4 楼 邮 编：518029

联系人：黄伟卿 责任编辑：吴泽婷

电 话：0755-82470728 电 话：0755-82470650

网 址：<http://www.szmhf.com> 微信公众号：szmhf01

